

中 · 國 · 皇 · 帝 · 后 · 百 · 位

皇
后
百
位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嘉庆

远方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十五阿哥继位	(1)
第二章	恭聆圣训	(22)
第三章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50)
第四章	整顿吏治	(65)
第五章	用人与言路	(76)
第六章	禁矿与限制移边	(110)
第七章	风雨飘摇	(125)
第八章	天理教徒闯京城	(161)
第九章	猝死之谜	(217)
第十章	宫廷生活与作风	(239)



第一章 十五阿哥继位



嘉

庆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凌晨丑时，清王室的又一位皇子诞生于御园之天地一家春，他被取名为爱新觉罗·颙琰，这就是后来受禅嗣位、对清代历史有一定影响的嘉庆帝。

颙琰的出世，对于乾隆皇帝弘历的家庭生活来说，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喜庆事。说它不大，主要是颙琰既非乾隆的长子、独子，也不是嫡子，所以算不上是什么头等的大喜事。说它不小，就是在过去，人们总是希望多子多孙，多福多寿，更何况是封建帝王喜添贵子呢？！早在颙琰诞生的这一年元旦，乾隆就以其抑捺不住的喜悦之情，在御绘的《岁朝图》志语中，写下了“迓新韶嘉庆”之句，颙琰嗣位后之所以改元嘉庆，显然是与这一诗句相应的。再说颙琰的生母魏佳氏，本来是一般的庶妃，她之所以接连地被晋封为贵妃和皇贵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自乾隆二十二年起，为乾隆连生四子，乾隆对此能不高兴吗？颙琰正是在这不大不小的喜庆气氛中降临人世的。

颙琰在乾隆诸子中，排行第十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他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确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首先是行次问题，这对于承继帝位是至关重要的。乾隆共有十七个儿子，而颙琰却排在第十五位。这个行次，无论怎么





算都是靠后的，如果按照汉族历代王朝传统的建储法，凭这一行次要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其希望实在是微乎其微，除非是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变。当然，满族有满族自己的规矩，清王室在承继帝位问题上，并没有完全遵循汉族王朝的框框套套，事实上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清圣祖玄烨、清世宗胤禔、清高宗弘历的继位，都不是由于居长、居嫡所致。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居长居嫡在清代帝位继承上无关紧要，只不过是清王室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绝对化而已。

清代前期帝位继承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有实力派的问题，如皇太极虽说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却凭一人独掌两黄旗的雄厚实力，倾倒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而继承汗位；有两强相争，第三者得利的，如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皇太极死后，由于多尔袞和豪格两强相争不下，才得以被拥戴为帝；有直接参与争夺的，如康熙的第四子胤禔的继位；也有某种偶然性因素起作用的，如玄烨之受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喜爱，弘历则因几位兄长或早逝、或品行不端而得获帝位。但应该看到，汉族王朝那种传统的立嫡立长的建储制度，对清王朝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象清太宗皇太极去世时，豪格继位的呼声本来很高，这不仅是由于他立下诸皇子无与伦比的赫赫战功，更重要的是他是皇长子，在“无嫡立长”的情况下，自然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只是由于他的强劲竞争对手、年龄比他还小三岁的叔叔多尔袞从中作梗，为了避免公开分裂和内战，最后双方都作了必要的退让，选立了年幼的九弟福临。不过这种弃长立幼的做法，在当时已遭到非议。朝鲜使臣李衿从沈阳发回的密报说：“清汗（指皇太极）于本月初九日夜暴逝，九王（指多尔袞）废长子虎口王（指豪格）而立其第三子（指福临），年甫六岁，群情颇不悦。”正说明了无嫡立长的嗣位法，对清王室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了。

又如清圣祖玄烨的首次建储就很典型，他不仅打破了清朝



皇帝生前不预立皇太子的惯例，而且公开确认了立嫡立长的建储原则。康熙十四年（1675），当玄烨还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便急不及待地正式册立刚满周岁的嫡子允礽为皇太子，并且颁诏天下。

允礽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所生，他虽是皇二子，但由于其亲兄承祜四岁夭亡，不叙齿，故允礽实际上是嫡长子。故允礽之被册立，标志着嫡长继承制已为清王室所确认。其后，由于康熙诸子对储位的争夺异常激烈，允礽本人也日渐骄纵，玄烨遂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以“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不孝不仁”等罪名，第一次把皇太子允礽废掉。但过了不久，玄烨对这一处理便有所后悔，同时也是为了遏止诸子争夺储位斗争的进一步扩大和激化，再一次宣告立嫡的原则，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复立允礽为太子。由于允礽此人实在不争气，在复立后仍不知悔改，继续胡作非为，不断扩大“太子党”的势力。这样，迫使玄烨不得不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再度将允礽废掉，把他禁锢于咸安宫。而皇四子胤禛却在这场持续不断的储位斗争中，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允礽尽管最终未能承继帝业，但立嫡立长制的被确认，却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颙琰的处境。在他出生之前，乾隆已经有过十四个皇子，但说来也怪，这些天之骄子并没有获得皇天的特别眷佑，其中大部分是“天命不济”，十四位兄长竟有八位过早的夭折，卒年大的只有二十五、六岁；小的仅有几个月。这种情况对于颙琰是“祸”是“福”，关系甚大。又因为乾隆的立嫡的观念，较之乃祖康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有关嫡子的情况，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乾隆嫡子有二。其一是皇次子、嫡长子永琮，生于雍正八年（1730）六月，生母是当时的嫡福晋、其后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据说这位正宫娘娘为人贤淑，性尚恭俭，“平居以通草





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岁时以鹿羔毳毼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所以乾隆对她甚是宠爱，再加上喜得嫡子，于是母子二人在宫中所处的地位，除乾隆生母、孝圣皇太后钮祜禄氏外，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早在乾隆元年（1736）七月，弘历便遵用乃父雍正所创的密建家法，将年仅七岁的嫡长子永璉内定为皇储，亲书其名，密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只是由于永璉没有福气，只活了九岁，在乾隆三年（1738）十月病死了。乾隆为此发布上谕说：

“永璉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皇考命名，隐示承宗器之意。朕御极后，恪守成式，亲书密旨，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后，是虽未册立，已命为皇太子矣。今既薨逝，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仪注行。”

这一上谕，一方面反映了乾隆立嫡观念十分强烈，同时由于永璉的逝去，使他不得不把第一次内定的皇储公开，正式册赠为皇太子，赐谥“端慧”。所以永璉又被称为端慧太子。

乾隆的第二个嫡子，是皇七子永琮，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也就是说距乃兄之后十七年出世。这样的嫡子实在难得，乾隆也的确为此高兴过一阵子，看来传嫡又有了希望，“高宗属意焉”。“拟书名臧贮，继念其年尚幼稚而未果。”但老天爷好象是有意捉弄这位立嫡心切的乾隆帝，永琮的命运比他的亲哥哥永璉还糟，只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于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因出痘去世。命丧仪比一般皇子从优，谥“悼敏”。乾隆在上谕中说了这样一段既含混又真切的话：“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此话看似发问，实是回答，看来只好半是怨天，半是责己了。当时，颉颃虽然尚未出世，永琮的早殇好象与他毫不相干，然而从乾隆决心立嫡这一点看，其关系可大了。所以在事隔五十二年之后，颉颃作为实现了亲政



的嘉庆帝，心里不由得不想起这位享年仅两岁、而他又从未见过面的七阿哥，并在嘉庆四年（1799）三月追封他为“哲亲王”。这或许是出于某种“感恩”吧。

两位嫡子的早逝，使乾隆立嫡的愿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乾隆十三年（1748），皇后富察氏去世，使乾隆的立嫡想法完全绝望了。

在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曾另立皇后。此人名纳喇氏，原是侧室福晋，乾隆二年封嫔妃，十年十一月进贵妃。为了填补中宫的空缺，在十四年四月先晋封皇贵妃，命统摄六宫事，于十五年（1750）八月册立为皇后。纳喇氏生有两子，即皇十二子永璉和皇十三子永璩。永璉活得稍长一点，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去世，年二十五岁。永璩则三岁就夭折了。

立嫡既不可能，立长又如何呢？乾隆的长子永璜，生于雍正六年（1728）五月，生母是哲悯皇贵妃富察氏，她尚未等到乾隆继位，便于雍正十三年（1735）去世了。她的封号，是乾隆即位后追封的，先封哲妃，再晋皇贵妃。永璜八岁丧母，这对其在宫中的地位不能不有所影响。在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时，“永璜迎丧，高宗斥其不知礼，切责之。”连永璜的师傅与谄达也因此受到罚俸的处分。仅过了三个月，因廷臣议立皇太子事，乾隆再次“责皇长子于皇后大事无哀慕之诚”，这对于皇长子来说，当然是很不体面的。不知与此事有没有关系，只过了一年多，永璜便病倒了，在病危时，乾隆才封他为定亲王。紧接着，这位皇长子便与世长辞了。

在顒琰出世之前死去的还有三位异母兄长，这就是皇三子永璘和皇九子、皇十子。老九、老十只两三岁便夭折了，未有命名。三阿哥永璘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生母是纯惠皇贵妃苏佳氏。永璘虽说是庶妃所出，然当时在嫡绝长殁的情况下，他叙齿居前，当是有机可乘的。可惜他同样天命不济，在顒琰出世前三个月（乾隆二十五年七月）病死，终年仅



二十六岁，被迫封为循郡王。

还值得一提的是顓琰的亲哥哥永璐，他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排行第十四。但他也只活了四岁，在顓琰出生的当年三月病死。

以上八位兄长的早逝，对于顓琰日后的嗣位，无疑是关系甚大。到顓琰出世时，在他前面还有六位异母哥哥，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废后纳喇氏之于永璫外，就是淑嘉皇贵妃金佳氏所生的皇四子永璘、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瑔；愉贵妃珂里叶特氏所生的皇五子永琪；以及纯惠皇贵妃苏佳氏所生的皇六子永瑢。面刚出世的顓琰，按当时的叙齿虽说“升”到了第七位，但其嗣承大位的希望，仍是微乎其微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就得半靠机遇，半靠自我奋斗了。

顓琰在初时之所以不大显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母后台不太硬。在封建时代，一般来说是“母凭子贵”，但反过来说，母亲的地位及影响，有时也对儿子的命运和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在宫廷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远的不用说，清王室的情况就很突出，象世祖福临之得以继位，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特殊的才干，或立下过什么赫赫的功绩，面是和他的生母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来庄妃是皇太极晚年惟一的宠妃，其子福临在嗣位问题上自然占有某些不可言喻的优势，在各方争持不下的情况下，把他抬出来是符合先帝心愿，使各派势力无话可说；二来在争夺帝位的激烈斗争中，庄妃也善于周旋与笼络，使各实力派相互制约，寻求折衷，最后只好让福临嗣位。圣祖玄烨的生母佟氏，虽不见宠于顺治帝，却受到了顺治生母孝庄皇太后的特别疼爱，这不仅大大地改善了佟氏在宫中的地位，而且直接决定着玄烨的前途。

然而顓琰却没有那么好的天份。他的生母魏佳氏，既无特殊的本领，又无任何特殊的背景。她的父亲清泰，只是个不入传的內管领，后家本属汉军，其后才抬入满洲旗。魏佳氏入宫



后，也只是个很一般的贵人，直到乾隆十年（1745）才封为令嫔，这与同时期众多的后妃相比，显然是低格的。她共育有四子二女，按时间顺序排列是：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生皇七女和静固伦公主；二十二年七月生皇十四子永璐（早殇）；二十三年七月生皇九女和恪和硕公主；二十五年十月生皇十五子、本书主人公颢琰；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皇十六子（四岁殇、未命名）；三十一年五月生皇十七子永璘。从这份时间表里可以看出，佟氏所生子女基本上是靠后的，而且间隔较密，说明她在这段时间已获得乾隆一定的宠遇，但直到三十年六月，她才被晋封为皇贵妃，虽说地位正在上升，但也不算上是什么特别的恩宠，到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去世，终年四十九岁，谥“令懿”。至于被册赠为孝仪纯皇后，那是颢琰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后的事了。

颢琰自幼由庆妃陆氏抚育，但这位养母在宫中的地位也很一般，她本身未生育子女，乾隆初被封为庆嫔，二十四年十二月晋庆妃，三十六年再晋庆贵妃，至于庆恭皇贵妃的封号，则是颢琰亲政后追尊的。因此，这位养母也不可能给颢琰的继承大位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这是十分清楚的。

颢琰在长达三十六年的皇子生活中，从来未有提督师旅、征战四方，因而谈不上有什么战功；也从未督官临民、治理政务，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政绩；就连乾隆十分频繁的巡游天下，除每年例行的秋猕木兰外，颢琰侍随的机会也屈指可数。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皇子时代的颢琰，确实是一位不大显眼的十五阿哥。

清朝前期的皇帝，在继位之前都有不同的经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清太宗皇太极，他过的是戎马生涯，无论在称帝前还是在称帝后，都在统帅八旗，奋战疆场，他的皇子时代，可说是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二是世祖福临和圣祖玄烨，他们都是幼年承继大统。福临即位时年仅六岁；玄烨即位时也只有八岁，所以他们的皇子生涯，既短促又简单，他们的才干与智慧，都是在做了皇帝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三是世宗胤禛，他的皇子时代特别长，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以继承帝位，其活动内容也相当广泛，有学习生活、随帝巡视、参预军政决策、督师从征、审理案件等，但更多的是直接参与争夺帝位的斗争。而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日后称帝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就是高宗弘历和颙琰了。他们的皇子时代，与上述诸帝大不相同，基本上是过着书斋生活。弘历在临政前夕，还算和鄂尔泰一起办理过苗疆事务，而颙琰却连这点实践也不曾有。同时，弘历即位时只有二十五岁，而颙琰嗣位时已经是三十七岁了。这三十多年的书斋生活，虽说是漫长的，但对颙琰来说却是十分有益的。

清朝皇室有一个好规矩，就是对皇子读书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康熙时开始就是这样。皇子长到六岁，就必须入尚书房从师学习。凡入值尚书房的师傅，都是经过皇帝亲自严格挑选的。象乾隆元年正月，弘历即位不久就着手抓诸皇子的学习，挑选了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梦、邵基等六人，任皇子师傅。开学之日，还要郑重其事地举行拜师礼，并而谕张廷玉等人说：

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

这一交待是必要的。因为向皇子授书，不同寻常，它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对于这些作为臣下的师傅们，若事先不给吃“定心丸”，不赐予“上方剑”，是很难获得良好效果的。与



此同时，乾隆还谆谆告诫诸皇子说：“师傅之教，当听受无遗。”这些话，既是上谕，又是官规，因而实际执行情况还是相当好的。当时入值内廷的赵翼曾颇有感触地写下了一段纪实：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拉数人（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往来。黑暗中沉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均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这番话，自然是就总的方面说的，事实上无论皇子还是师傅，在漫长的岁月里，不可能完全不触犯规章，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乾隆都是严加诘责，并作出相应的惩处。

頤琰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的，并渡过他皇子时代那漫长的书斋生活。后来，他为刊刻自己的《味余书室全集》写了一篇序言，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读书生活，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该文道：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幼而习，长而行，安身立命之处，必应以经书为标准。我朝龙兴辽沈，国语骑射诚为最要根本，固应亿万祺敬承勿懈。然为海寓之主，亦不能不以文治化成天下。故天家子弟，六龄即入上书房从师受业，陶冶性情，涵濡德义，日亲宿



儒，克勤力学，虽才质有不同，聪钝有互异，而化其骄泰之性，使知孝悌之方，悟经书之奥，功非浅鲜矣。视彼前朝太子，偶一出阁讲学片时者，奚啻天壤之分哉。予悟性迟钝，乙酉年（乾隆三十年，1765）入学，从觉罗奉硕亭（宽）先生读书；至壬辰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而五经粗毕，从谢东墅（墉）先生学今体诗；至丙申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始，从朱石君（珪）先生学古文并古体诗，直至今日时于几暇，仍相商酌讨论。书窗景况，宛然如昨日也。

这份序言，颉琰既谈到了他读书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也谈到了他从师及习学的简历。他虽然谦称“悟性迟钝”，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的脑子不但不笨，而且相当聪敏，就拿读经来说，六岁入学，十三岁即通五经，这就很不简单了。难怪乾隆在他通经后的第二年，即癸巳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遵用密建家法，把颉琰内定为皇储，又是祀天，又是祭祖，祈求皇天保佑这位刚满十四岁的嗣君。可以这样说，颉琰之得以嗣承大位，很大程度是他自己克勤力学、涵濡德义的结果。

当然，颉琰对于自己被内定为皇储，在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对于克勤力学的深义，却从师傅朱石君先生那里得到了启发，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这一点，还得从“味余书室”的命名谈起，颉琰曾写过一篇《味余书室记》说：

予居禁中，有室五楹，不雕不绘，公余绎昼，所习书史，游艺于诗文，或临法帖一幅，怡然自得其趣也。欲题其楣端请于石君先生。先生曰：勤学者有余，怠者不足，有余可味也，名之曰味余书室。承先生嘉惠之意而为之记曰：夫余之义亦大矣。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盖闻禹惜寸阴，晋陶侃言众人当惜分阴，为学者可不勉哉！……苏子瞻诗云，此生有味在三余，其意深矣。……予质鲁恒，以不学为戒，故三



冬甲夜，孜孜于退食之时，游情于圣贤之籍，是予之策其余力也，若云知味则未之逮。是为记。

由于“余而可味”包含着很深的哲理，所以顾琰特别喜欢“味余书室”这一命名，并常以此自勉，没有虚度这一段宝贵的时光。他的师傅朱珪后来为《味余书室全集》写了一个跋，实际上是对这位当年的学生作个基本评价：

臣自乾隆丙申（四十一年）夏五月入直尚书房，得侍讲案，……窥我皇上生知睿圣，好学敏求，诵读则过目不忘，勤孜则昕夕不怠，计日课诗，岁不下五百余首，各体咸备，义必正大，声中黄宫，不为雕篆纤掣之音，洞烛于中而发之以诚，须乎至仁之心，宜天祐之所笃，申万民之所托命也。文则执经心而镜史志，条理综贯内圣外王之学。

朱珪的这番评价，看来并非完全出于对皇帝的颂扬，通观《味余书室全集》所载诗文，确实不乏纵论古今、阐发经史的力作。事实上顾琰的思想、品质、性格、作风等等，基本上是在“味余书室”读书这段时间里形成的，这对于他的为人与为政关系甚大，其中又突出地体现在“勤”、“俭”、“仁”、“慎”这四个方面。

关于“勤”，顾琰不仅注意身体力行，而且对这一命题的议论也最多，其中的《民生在勤论》，写作时间较早，可以代表他关于“勤”的原始思想。文曰：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自天子以至庶民，咸知勤之为要，则庶政修而万事理矣。……贵贱之等、内外之分虽有不同，而朝夕兢惕，各勉于勤，自能臻善而寡过也。人日习勤劳则日近于善矣，日习惰弛则日近于恶矣。如其不勤，则为学者安于下流而不能上达，为治者惰于事功而庶政怠荒，欲求家治、天下平，其可得乎？！故勤者夫人所当勉者也。若农夫不勤则



无食；桑妇不勤则无衣；士大夫不勤则无以保家；公卿不勤则无以佐治，其害奚胜言哉。书曰：惟日孜孜，可不戒与？！可不勉与？！

这些话并非颉颃关起门来空发议论，而是他日后勤政的思想基础。为学以勤，为政以勤，始终如一。在这方面，颉颃可说是当之无愧的。

关于“俭”，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但是否具有这种思想认识，情况就大不一样。颉颃对于乃父乾隆后期的肆意奢华，口里虽不好直说，但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所以他经常借读经来大发议论，其中有一篇题为《礼与其奢也宁俭论》的文章道：

孔子曰：与其奢也宁俭者何哉？原乎礼制之始，有朴素之质，而后有周旋之文，不务浮华，专事节俭，此太古之风也。……后世踵事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竞奢靡之习，忘节俭之风，而礼之本意失矣。……移风易俗、拨乱反正之道，莫善于俭也。为学为治者，岂可以是为常谈而忽之哉。

这位十五阿哥的确聪明得很，他首先把孔大圣人的请出来，即使乾隆看了也无话可说，然后借题发挥，抨击一番，亦属有理有节，不失分寸。所谓“节俭乃太古之风”，其实包含着两层含义，既是指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也是指满族自己的开山鼻祖。至于所说的“后世踵事增华”指的是谁？这就请对号入座了。所以他在亲政后实行拨乱反正，把崇俭黜奢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关于“仁”，颉颃在习学时就说过：

博爱之谓仁，尚矣。……圣人应天受命，调御万方，作之君，作之师，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家国以治，天下以平，流泽子孙，其根本深厚于仁。

所谓在家为孝，在外为仁，两者本来就是紧密相联的，而顓頊确是两者兼而有之。顓頊之孝，早已为乾隆及老祖母孝圣宪皇太后所称许，这也是他得以嗣承大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至于顓頊之仁，这里暂不多说，拟结合他亲政后的具体情况再加考察。

关于“慎”，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广，顓頊曾有诗句提到：“图书率性参精密，默养心田慎满盈。”可见他从小就很注意对于“慎”的修养，诸如慎为政、慎用刑、慎择臣等等。就拿慎用刑来说，顓頊认为：

用刑之大旨，不外明慎。明者知其事之原委，察其情之真伪，两造既备，虚衷听断，如日之光，不遗幽暗，犯法者甘心认罪，受害者无嗔怨，此明之功效也。慎者，……一字无虚始可定案，片言不实勿厌重推。

顓頊在当时还谈不上有什么实践经验，但他对于乾隆后期的情况还是注意观察的，他所讲的明与慎的相互关系，也是合乎道理的。事情往往是由慎而明，由明而断。这样，事情就有可能办得好一些，而历代种种冤假错案的出现，除居心不良、贪赃枉法者外，难道不正是既不明又不慎的结果吗？！所谓“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表面上看好象很聪明、很有魄力，其实是愚蠢至极，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其结果只能是把事情办坏。

总而言之，顓頊在这漫长的“味余书室”岁月里，学业与思想均已趋于成熟。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孜孜以求、勤勉好学所致；另一方面也与诸师的谆谆善诱，多方启迪分不开。顓頊自己说过：“予六岁入学，习经书，十三学诗，十七属文，书窗朝夕，行帐寒暑，幸无间断。若今体格，初从学于（谢）东墅师傅；古体诗及古文，从（朱）石君师傅习焉。予赋性鲁钝，赖二先生切磋琢磨之功，十有余年，略开茅塞……”。于诸师中，最受顓頊敬重的，当首推朱珪。



朱珪，字石君，颺琰惯称他为石君先生。珪少时受经于大学士朱轼，“八岁即操觚为文，文体倔犟苍古”，年十九登进士，为乾隆所赏识，尝称：“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初出任地方官，“四十年，召入觐，改授侍讲学士，直上书房，侍仁宗学。”自此深受颺琰敬重。乾隆四十四年（1779），朱珪奉命典试福建，临行赠颺琰五箴，“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仁宗力行之，后亲政，尝置左右。”可见朱珪对颺琰思想影响甚深。当时颺琰也赋诗送别。诗曰：

.....

玉尺抡英奇，黉采辉南斗。
 硕儒振士风，学艺焙醇厚。
 行旌飡河染，驰赴瓊瑶阜。
 三载坐春风，半岁别云久。
 心怀去路遥，目极天涯有。
 雁落远浦沙，风送长亭柳。

.....

送君歌骊驹，离情情谁剖。

次年，朱珪又奉命总督福建学政，因这次不是临时差使，所以颺琰的离情别绪显得更深厚、更强烈，撰成长律六章，与师志别。现择录其中三章如下：

衡文三载例推迁，一纸纶音下九天。
 何幸仕林瞻宿彦，由来才望属名贤。
 满堂桃李声华灿，奕世经书清白传。
 又拥轺车向闽越，甘棠遗荫喜重联。
 欲去难留可若何，片言相赠耐吟哦。
 仙霞秋色迎天节，须女文光烛晓河。
 别意时萦雁过处，离情空见月明多。
 人生聚会原无定，且为斯须驻玉珂。
 屈指流光五载期，就将启导荷贤师。